

# 透析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

冉思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47)

**摘 要:** 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下,相当部分论述萨义德的文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究其原因,论述者对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有意无意地忽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探讨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在对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情怀的论述中寻求正确理解萨义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途径。

**关键词:** 萨义德;东方学;公共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2(2007)01-0019-04

—

2003年9月25日凌晨,爱德华·萨义德,这位曾出版其名著《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而轰动全球的学者,在纽约与世长辞了。我们可以看到,25年前《东方学》的横空出世不仅使当时还身为副教授的萨义德一夜窜红,暴得大名,更为重要的是,这位严谨而温和的学者的所谓“一气呵成”之作揭橥了一场影响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浪潮。本文无意探讨“东方学”的相关内容,而是试图讨论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在对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情怀的论述中寻求正确理解萨义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途径。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相当部分论者不惜笔力地强调萨义德的双重身份,指出萨义德的民族身份、中东情结和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导致了其人格事实上的分裂,于是,批评家、政治活动家、巴勒斯坦移民、美国公民、伊斯兰教的同情者的多重背景和双重身份(美裔巴勒斯坦人)似乎理所当然地化约为萨义德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对萨义德接受的西方精英教育的过分强调有意无意地指向了萨义德与其“东方主义”的“共谋”。与“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一样,由于萨义德本身是“人格分裂”者、“东方主义”的共谋者,那么“渴望从西方边缘知识分子跻身西方主流文化”的萨义德,当然就与西方形成了“某种类类似于雇员和雇

主的结构秩序”<sup>[1]</sup>。按此逻辑,萨义德理论从丰腴的西方思想母体脱胎之后,诸如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公民权利、表述/再现问题、批判意识等西方话语就成了萨氏的谋生之道。换言之,拿着西方话语的批判武器批判西方各种弊端的萨义德只是为稻粱谋?那么作为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批评,“逐渐从一种旨在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公共行为向一种谋生之道转变”<sup>[1]</sup>。事实上,这些类似的想法消解了萨义德作为独立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式知识分子的重要特质,忽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而一味强调萨氏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背景,以及在西方生存所必需的策略性考虑,这无疑是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萨义德的身份问题固然重要,也并非不能作为研究萨义德的要素,但对这一问题的诘问和扪伐运作到对他的批判精神和诸如《东方学》、《文化帝国主义》给予人们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启示意义的责难上面显然欠妥。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焦点集中到萨义德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等更为本质的特征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氏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而打上的西方烙印减少了其著作的战斗性,我们也可以认为萨氏的理论有促使西方反观自身,深刻内省,继而调整对外政策(至少是文化政策)的目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萨

\* 收稿日期 2006-10-12

作者简介:冉思玮(1982-),男,重庆市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万方数据

义德接受西方精英教育不假,但他毕竟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是一个有着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西式教育只能作为他言说的工具而非本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呼吁第三世界人民警惕西方柔性强权(软权力)的侵略,抵制非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后殖民主义渗透,关注整个人类社会才是具备知识分子良心的公共型知识分子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确应该警惕西方借人性、人权来干涉别国内政,但我们也应看到人类世界总有一个最高标准和终极关怀。因此,民族身份问题、背景因素、温和节制态度等要素都不应被视作主导力量来挾伐其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贡献。也许关注知识分子的责任才是正确解读萨义德及其著作的途径。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 二

从事二十世纪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学者许纪霖对知识分子的来源、定义、角色、作用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述,特别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分析颇具现实意义。他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来源,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一批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痛感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强烈的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sup>[23]</sup>这表明知识分子从诞生初始即处于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抗的、离经叛道式的存在状态,也即是拥享公共空间。第二个则来源于法国。1894年,以左拉、雨果为首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文人表达了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义愤,也因此被他们的敌对分子蔑称为“知识分子”,尽管该词实际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它同时也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这样一批文人、作家经常坐在咖啡馆里就社会和政治等公共问题高谈阔论,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主体正是这样一批被葛兰西的观念区分知识分子类型中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sup>[24]</sup>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

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sup>[25]</sup>笔者以为,萨义德正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后期再次复兴的代表。与那些阶级化、党派化、学院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绝大多数)相比,独立的批判意识显得尤为可贵。令人遗憾地是,众多论述萨义德的著作往往忽略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和道德良心,他们紧紧抓住萨义德的双重身份和接受的西方精英教育,提出所谓“共谋”、“人格分裂”等问题,进而在断章取义的引证和论述中,看似独辟蹊径地把萨义德的批判精神归结为背地里与殖民话语勾结,本质化西方,摇摆于真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等等,实则并未弄清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事实上是促使萨义德撰写著作和强烈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真正动因。在他的诸多论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其作为专业学者鞭辟入里的剖析,更能体会到一个有着独立批判意识,始终不放弃文化和社会批判职责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责任和良心。我们知道,世界进入20世纪,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知识体制不断扩张、强化,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的大学、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sup>[26]</sup>萨义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这说明他是得到西方主流文化认可的,也意味着他进入了“知识体制”。然而,萨义德并没有像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成为“有机”整体的一员,而是保持着精神性的公共型知识分子。萨义德曾坦言:“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感受,对我来说非常强烈。我会说。贯穿我人生最强烈的那一条线就是:我总是处在事情之内和之外,从未真正很长久地属于任何东西。”<sup>[27]</sup>保持清醒的意识,奋力站在体制以外成就了其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性。我们感慨着萨义德蓬蒿人式的气质,他在那些明显带有“普泛性”色彩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中踽踽独行,在“主控型”文化试图消除构成所有文化的那些不纯物和混杂物中始终坚持自己关注公共社会的立场。有感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这是一个缺乏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

学院化了,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sup>〔2〕<sup>21</sup></sup>当然,就更不能奢谈他们本应承担的社会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那么被集团和组织笼络收买,成为其喉舌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萨义德呼唤着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认为他们的公共活动“既不遵循预定的方案,也不能被强迫顺从于某种口号、正统的党的路线或一成不变的教条。”<sup>〔4〕</sup>同时,虽然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具有不同的信仰,但萨义德认为在涉及人类遭受苦难、面临不幸的现实方面,大家仍要坚持共同的真理标准,缄默不语,明哲保身,狭隘的民族利益、民族主义都应摒弃。在《东方学》及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萨义德都“力图说明所谓东方、西方以及有关的种种带种族色彩的观念,都是虚构而非现实,是‘神话式的抽象’。”<sup>〔4〕</sup>这种对东/西二元模式的消解来自于公共型知识分子对于整个人类前途的思考、辨析、关注和某种生成性的忧患意识。这样,萨义德所谓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不仅要对国家内部社会予以关注,而且还应不遗余力地阐述整个人类社会趋于和睦的前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是一套共同的元话语,比如象利奥塔所说的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这些‘宏大叙事’。”<sup>〔2〕<sup>15-16</sup></sup>因此,萨义德无疑是属于传统的、无机的知识分子类型,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担负道德正义,这也是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本质是“业余的”,在他心目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业余的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知识的体制,缺乏背叛的反抗精神。”<sup>〔2〕<sup>22</sup></sup>总之,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的那份公共情怀;就像席尔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做出自己的解答。<sup>〔2〕<sup>23</sup></sup>论述至此,回顾我上面提到过并持怀疑态度的“分裂人格”论、“共谋”论,我们似乎可以换一种口吻予以探讨。如果说持这些论调的阐述者有意忽略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责任、道德、良心过于严重的话,那么他们至少是过分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悖论性表征。这一悖论指的是像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乔姆斯基等人,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除了他们道德的勇气外,的确首先因为他们是大学教

万方数据

授、是专家,而且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他们就有了发言资格,即话语权力。换言之,他们自身的合法性是知识分子体制内部提供的,如果缺少了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萨义德们就无法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讲,萨义德等人最终由边缘进入了——至少是部分地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从此,他们站在西方大学的讲台上,一方面讲授、传播着多少与西方意识形态有关的传统至现代的文化,一方面又呼吁公共责任,关注东西文化冲突,同情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反抗西方文化霸权,抵制民主情绪蔓延。这样的二重角色的确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进而被推论出不是真正替东方、贱民、妇女以及一切被压抑的群体说话,等等。对于该类误解,笔者已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论述与强调中予以了反驳,这里意欲说明的是,即使这种悖论存在,即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但我们仍能够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径,事实上,萨义德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了我们一个铁证。萨义德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站在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也不是维护东方或西方的利益,而是超然于任何集团利益之上的是非和真理标准,以之作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依据<sup>〔4〕</sup>。因此,我们看到,萨义德一方面对西方长久以来以各种暴力方式加在属民身上,并以理性——文明的名义予以正当化的霸权行为猛烈批判,一方面又对人们视他为伊斯兰的大辩护者而耿耿于怀,并斥之为“胡说八道”。之所以能有如此独立的认识,正是因为其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独立的、非体制化的批评立场。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应当“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团思想,以及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的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怕被烧死在火堆上,不怕被孤立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处于几乎随时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的状态。”<sup>〔4〕</sup>这一西绪弗斯式的豪言壮行平添了几许悲剧性色彩,却让我们铭记于心。一些接受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既否认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和体制文化应有的批判责任,又以民族主义式的东西二元模式的根本对立否定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透过一部分批评家激扬文字式的批此驳彼的表象,或许他们才是最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或至少不愿去个性批判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与萨义德式公共知识分子相去甚远了。

### 三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探骊得珠式的叩问和发现绝非策略性的,他竭尽全力地规划并实施着理想的知识分子的蓝图,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时刻警醒着我们,在他长期致力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和作用的思想对话中留给我们的不是罅隙性评论的可能,而是宏大的元话语背景下知识分子愿景的规约和永恒不变的公共情怀。与他在《东方学》等著作中对东西二元对立模式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和消解不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始终“极力呼唤的是在文化、社会、传统、民族等等宏大集体概念笼罩之下,仍然能随时保持独立性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sup>[4]</sup>建构着公共型知识分子的元话语。在文化相对主义蔚然成风之际,在客观性、客观现实受到普遍怀疑的今天,萨义德通过论说知识分子问题仍然坚持普遍人权和普遍真理标准如果没有让人感到意外,也至少是感慨着他有些悲壮的孤独与痛苦。然而,他“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sup>[5]</sup>同时,这也恰恰是萨义德高出一般学院中职业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之处,因为“他主张学院里的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能在现实世界中起

作用。如果不承认客观实际,不承认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有普遍适用的真理标准和行为标准,那就不可能是使理论和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发生任何关系,具有任何政治意义。”<sup>[4]</sup>这里,笔者显然不是责难象牙塔里的专业化学者,因为我们的确需要敢于坐冷板凳的圣断绝学式的专家,只是在此论文中,笔者更关注公共型知识分子。综观大量研究文章,很少有论者注意萨义德更为本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特性,而是侧重于对其所采用的批评策略(如后现代的消解主义方法论)、话语方式以及所处的流亡状态、多元文化背景、接受的西方精英教育乃至温和而节制的态度所导致的立场不坚定予以要么是否定性的诘问,要么就是完全褒扬性的评价。批评家们似乎真的不理解——正如提莫塞·布瑞南所说:“他(艾哈迈德——引者注)简直无法想象得出,当一个人被给予巨大的荣誉、备受恭维的同时,如何可能又对权力构成挑战的。”<sup>[6]</sup>萨义德的确做到了,他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整体;拒绝划分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并且尽力将三者的才能——创造力、学识和判断力——融会在公众知识分子这一美国文化中最为少有的角色。”<sup>[7]</sup>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责任,并且始终身体力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参考文献:

- [1] 赵淳. 赛义德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共谋[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 155-159.
- [2]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3] 薇思瓦纳珊, 单德兴.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95.
- [4] 张隆溪. 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J]. 读书, 1997(7): 67-71.
- [5] 王宁.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批评[J]. 文艺研究, 2003(5): 19-27.
- [6] 提莫塞·布瑞南. 坚毅[M]//王宁. 文学理论前沿(第三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22-223.
- [7] W. J. T. 米切尔. 世俗的预言·爱德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M]//王宁. 文学理论前沿(第三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13.

## A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Edward Said's Public Intellectual Identity

RAN Si - wei

( Arts and News School ,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47 , China )

**Abstract** In current realistic context , quite a lot essays on Edward Said misread him to different degrees. As to its reasons , the 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 ignorance of his public intellectu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To investigate his specific identity , this essay seeks a way to understand Said's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awareness of independence rights , expounding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 cares and concerns of intellectual's due.

**Keywords** Said ; orientalism ; public intellectual